

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

錢穆題



重印自誌

劉子健

感謝王德毅兄，給我鼓勵和幫助，使這拙作得以重印。

這書的錯誤和缺漏，恐怕很需要改正和充實。可是目前忙於研究南宋初期，時不我予，無從兼顧。只索就年來手頭所記，列爲「重印補正各點」，共廿六條，謹附於後。此外未妥之處，概請寬諒。

書目一無增減，因爲沒這必要。宋晞先生已經有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增訂本，極詳盡之能事。美國宋元史通訊時有英文書、文目錄的報導，偶而也有中文的和日文的目錄報導，再推而廣之，不妨參考每年一厚冊的東洋學文獻類目（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刊行）。

二十年來，中國人研究宋史，進展很多。宋史座談會初次相聚時，真不敢抱樂觀。而現在宋史研究集，竟已出了十五輯。近年他地學人也同樣努力，出版了宋史研究論文集和宋史論集。宋晞先生曾去香港講學，就地提倡舉辦宋史座談會。雖然一時沒編行論文集，但已開風氣。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已經準備在一九八四年冬召開國際宋史討論會。這些成績，都讓人欣慰之至。

從這些進展來看，這本書又何必重印呢？

讀者不嫌贅言，倒想借這機會，說明一下這本書的淵源，在重印時，本也想到寫篇序。否則在書後加個跋。但不論是序是跋，古人都有體例，不敢亂寫，也就未必能暢所欲言。所以這段文字，姑名之曰自誌。用白話說，就是自己的紀錄。

這本書起稿時是一九五九年。那時已經在美國十一年，深感中國朋友爲了職業，不得不用英文寫，因此立志用中文寫。第二年從關茲埠大學轉到西岸的史丹福大學，得到委員會同事的支持，擔任印費，交由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出版。緣起就是這樣。可是那些年新亞書院並沒有人負責發行推銷。因此連書商也不大有這書，圖書館也無從採購，傍人更不消說了。一九六七年，又用英文寫了一本歐陽修，是史丹福出版社刊行的。西方學友才稍爲知道一些。但是英文是縮本，內容遠不如中文的詳細。所以遲至今日，這本二十年的老書，還有重印，偶供參考的用處。

立志用中文來寫本書，爲什麼選歐陽修這題目呢？

因爲用英文寫過一篇范仲淹，又寫過一本王安石的改革（哈佛出版社），好像專寫人物。其實不然。因爲研究了一下范仲淹慶曆的小改良，又分析了一下王安石變法的大改革，才引起問題。小改良與大改革之間，是什麼情況？從這問題慢慢才發現北宋中葉有許多新興趨向，一往被忽視。而其中的主要分子，關鍵人物，莫過於歐陽修。他有多方面的活躍和影響。

爲什麼在寫范仲淹王安石的時候，還沒發現歐陽修的重要呢？

這就不得不說個人學力太淺。一九四六年離開中國以前，學的是西洋史和外交史。在關效埤的職務是教課，而且那時候學校也沒有中國書。洪業（煨蓮）老師也好奇的問我，怎會選了宋史這行？我只選過洪先生一課，對於他淵博精深，遇題追到底的考證功夫，只有崇敬，並沒學過。和他老先生熟是因爲太平洋戰敗，同拘於舊北大紅樓地下室日軍的監獄裡。夜深人靜，低聲長談。所以我答覆洪老師的問題，也直言無隱。我說，選宋史專攻，有兩層理由。從積極說，教通史的課，發現宋代的確是近代中國定型的時期，很值得從各方面去推究分析。從消極說，學校沒書，自己買不了多少。收入少，教完暑校再跑哥倫比亞和哈佛的大圖書館也看不了多少。洪先生久在哈佛，不容易體會這難處。如論唐史，要懂佛經，要熟唐詩，很難。元史要會蒙古文。明清史的書又極多。只有宋史，勉強還能拼得了。洪先生編有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的索引。宋史全部書目，大體上也不過十倍，四五百種。業餘苦讀，十年八年，多少會有點眉目。洪先生聽了這話，不禁苦笑。

沒有想到歐陽修這本書倒引起了幾位日本學人的注意。東京的青山定雄老先生，在東洋文庫，主持編纂宋史的各種工具書，如日文文獻，宋人傳記索引，宋代史年表等。他早有論文，講北宋江西的新興官僚。因此認爲歐陽修的確重要。京都的宮崎市定老先生，著作等身。曾有幾篇作品，講宋代士

風。他認為我敘述歐陽修，從學風和政風兩方面去看，還可以多事發揮。我在一九六七年到日本住了一年，主要在京都。又認識佐伯富教授。他除了研究著作之外，還致力於編纂各種索引。繼任他的梅原郁，中年教授，更是畏友。他也是既寫作，又編索引。談論起來，他們表示研究宋代的學術和政治，日本學人究竟隔膜，不如中國學人因為是自己的文化，能體會得較多較深。因此他們寄望於中國學人，多在這些方面創造成果。他們這些誠摯的看法，我也重視。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把這本舊書，從新充實？例如先廣徵博引，列為長編，再充分發揮？

個人陋見，以為既不能，也不必。一則方面太多，例如詩詞，例如經學，都是專門之學，非個人所能盡及。二則整理歷史，也受經濟學上所謂遞減的定律，再花很多時間，蒐集大量次要的材料，是否倒弄成事倍功半？三則寫歷史書，也得分量相稱。歐陽修固然重要。也許暫且有這樣一本書，大致可以概括。如果還要多寫，那末蘇東坡就不知要費幾千頁的書了。

再說近年也沒寫書的精力。先母和先兄等相繼去世。自己經兩次手術，幸而告痊。本科教學，開關兩門新課，編了兩本英文選讀，都和宋史無關。只有另外一本選讀，是宋代中國的變化。課餘只寫成些短文：如說明南宋早年勉強立國，如討論招安政策的作風造成政治上一般的粉飾敷衍，如介紹劉宰是現代前世界上最大的賑飢家，如考證三字經非王應麟所作，而陳淳教幼子已編了三字經。如唐代

極盛的馬球遊戲，北宋改爲腳踢，孝宗騎馬打球，被諫中止，從此中國尚武的體育，大爲衰落。但都沒精力，往長裡寫。所以這本舊作，也一直擱置。

不再寫歐陽修，有沒有其他的新興趣呢？

不但有，而且興趣很大。想研究南宋如何會變成和北宋不同。簡單說，十一世紀（也就是歐陽修這一代及其前後）顯著的突出，而十二世紀却步入尋常。十一世紀各方開拓，氣魄大。十二世紀注意充實，用心細。十一世紀勇於放射，光芒四射。十二世紀富於產量，精彩較少。十一世紀啟發，十二世紀選擇。這個關鍵性的大轉捩，影響深遠。中國文化從南宋到清末，陷入長期保守。像北宋十一世紀那樣外向的風起雲湧的邁進，永不再出現。始終就像南宋十二世紀那樣內向的修修補補的搞傳統，極少推陳出新。從而導致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恰巧最近這幾世紀，西方因新生而飛躍。中國從世界首位，降爲落後國家。這一個大關鍵，何等重要！

這課題極大，方面很廣。本人所能勉力而爲的，還是僅限於一向採用的途徑，歐陽修這本書標明是治學與從政。宮崎老先生所說是士風，出於中國舊籍，也是指學風與政風。拆穿了說，就是士大夫的兩方面。

那不是老套嗎？這要看分析的方法。本人所注意的學風，並不是類似哲學史，學術史，文學史的

汎論或專論，而是去看和政治有關的思潮，看當時思潮和政治環境的交織和互激。本人所注意的政風，也既非一般的政治史，或專門的官制史，而是看當時政策上的措置與運用，一面應付局面，一面處理思潮。換言之，就是士的一方面和大夫的一方面交互影響的發展。

用這種途徑去分析，有什麼深意嗎？

歷史作品，常和史觀有關。古今中外許多史觀都是一元論，抓一個主因。其實主因不一定是單數。有時很可能是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連帶關係。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士和大夫，思潮和政策，就可能是個例子，說明二元相關論。

主因具有決定性嗎？

先要澄清「決定」的涵義。是否主因能必然產生某種結果，不受偶發因素的牽連，頗似未卜先知，這就不敢斷言。主因能決定應當是指決定這文化的型態。簡言之，定型。近代文化，經濟發達，經濟是主因。但是比較人類學指示我們，較早的文化，未必如此。研究每一種文化，要看它文化的重心何在，才能發現主因。姑不論這種看法是否合理，何妨暫且假設——這是合乎科學方法的——去發掘一下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心，是否在統治階層。而在統治階層之中，士和大夫兩種身分的消長，是否具有有定型影響的主因？換言之，在傳統文化裡，士大夫的性格有多深？

經過二十年，這本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又新付重印。因為這書是走上這途徑先邁的一步，也許有點意義。希望是還能引起各方學人的討論，批評，和指教。藉以交換，十分感謝。

一九八四夏誌于美東卜林士屯大學

重印補正各點

(1) 頁四，提到歐陽修的詞，不脫花間派的風格。此語不甚妥，須另斟酌。

(2) 頁四至七，歐陽的「本論」和「朋黨論」兩篇名文，應當提一下，都已經有英文節譯，很受西方學術界的注意。

(3) 頁一二，註一，末段，近人丁傳靖，應作清代人。

(4) 又，同上，佐伯富教授編有各種索引，如宋史的職官志，兵志，刑法志都已經有索引。他的繼承人梅原郁教授也編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人名索引。本書出版略早，未能利用。假定今後另有同行，有意從事於增進的研究，以匡不逮，很可以從這些工具書下手。

(5) 又，同上，中國學人編纂工具書，更為有用的，首推王德毅教授。他除了和昌彼得，程元敏，和侯俊德諸先生合編六大本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外，又編了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這些工具佳作，貢獻甚大。此後宋史研究，不但方便多多，而且可以提高品質，取得空前的收穫。

(6) 頁四六，中間一段，從經學談到議論，應該引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國學基本叢書），卷六，頁

一四二，已經指出在歐陽的晚年，經學的議論漸變為政爭的糾紛。

(7) 頁五五，關於有名的「瀟岡肝表」，極盡孝思，而從此並未回鄉。可以加引王昶，金石萃編（清刊本），卷一三七，頁一五，有關於碑文的按語：「是建碑之後，未嘗到墓。而筠廊偶筆載黃山谷謂文忠歸家掃墓，見坑中雲霧。已非其實。」

(8) 頁八〇，歐陽讀梅堯臣（聖俞）詩。按梅也稱道歐詩。王應麟，困學紀聞（國學基本叢書），卷一八，頁一三八七，引王直方詩話，梅謂歐詩曰：「使我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一句云。」

(9) 頁八一，中段，論宋古文，應加陶宗儀的意見，認為宋古文，其實並不古。見輟耕錄（叢書集成本），卷九，頁一三五。

(10) 頁八六，有一個大缺漏。歐陽的「秋聲賦」，不但是古今上品，應當特別提出，而且譚有英法德各國文字，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流作品。

(11) 頁八七，第一段，宋人特別是南宋人對於歐陽的文章，最注重他的義理。如王應麟，困學紀聞（前引），卷一八，頁一三八〇——一，引蘇轍所撰歐陽神道碑：「公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

(12) 頁九三，註二二一之前，可加引困學紀聞（上條）同頁。歐見蘇文，函梅堯臣曰：「快哉，快哉。」

「
(13) 頁九四，中段，劉焯。據困學紀聞（上引），卷二〇，頁一五一四，劉著有東歸集。

(14) 同頁九四，論「醉翁亭記」用廿一個也字。有人以爲這句法脫胎於周易。王楙，野客叢書（叢書集成本），卷二七，頁二六八。論北宋人錢公輔的「越州井儀堂記」，評曰：「亦是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15) 頁九八，註二九及註三五，均宜加引金中樞，「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新亞學報，卷五，期二（一九六三年），頁八〇—八九。

(16) 頁一〇八起，討論歐陽的信仰問題，遺漏甚多。應該充分參酌各家所著的佛教史和道教史。例如契嵩和尚，有鑠津集，力攻排佛之非，力主儒佛本合，曾將其著作，投送歐陽修，韓琦等人。雖然沒有制止排佛，至少稍蔽其風。據說歐陽雖不同意契嵩的說法，却承認他文章寫得很好。其他有關的佛道事跡，茲不縷述。極簡單的說，宋代佛教，已趨劣勢。唯禪宗特盛，和士大夫往來。禪宗是否受士大夫影響，走向純中國式的佛教信仰，甚至不是純粹的佛教，這又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除各宗之外，一般寺院也漸不如唐代之盛。有兩個主要原因。宋代經濟茂盛，較前專業化，寺院在唐代所兼有的各種經濟功能，爲各行各業所代替。二則地方政府時常撥借利用寺

院的財富和勞力，少予補償。佛教之外，道教也有勢力，特別是在皇宮的各種人之間。但道教既無神學理論，也少推動士大夫的力量，所以還是比佛教差。雖然有真宗降天書，封禪的舉動，徽宗大事崇尚道教，而且很荒唐的自稱道君皇帝，其結果與預期相反，士大夫並不贊成。

(17) 頁一三二，歐陽以荻畫地習字。現代童話，小學課本都有。本書出版後好些年才看到一段類似的故事。韓元吉，桐陰舊話（說郛·涵芬樓本，卷二〇），頁三〇，記載作者的曾祖忠憲公，說：「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烈日及小雨，（忠憲公）張敝繖自蔽。以爲常。」此法較歐公尤妙。

(18) 頁一四三—四。關於范仲淹及呂夷簡對立的政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頁三六，詔書指摘范仲淹等，曰：「言事惑衆，離間君臣。自成朋黨，妄有薦引。」而所謂朋黨，並不限於范仲淹這些人。同書，職官六四，頁四一，罷葉清臣及吳遵，指摘他們和宋庠鄭戩他們「同時及第：以爲朋黨」。可見朋黨的惡稱是在濫用的。也可見呂夷簡度量不寬，時常排除異己。後人一直到朱熹都避免批評呂夷簡，無非因爲他的兒子呂公著等有名，而呂氏到南宋中葉還是有名的大族。例如朱熹的好友呂祖謙（選用東萊族望），就是呂家後代。又本書未多用宋會要輯稿，是一個缺點。

(19) 頁一五〇，註五四，歐陽撰范仲淹神道碑，說范呂解仇（見上條）。范子否認其事，將原文刪去一

節。可加引王昶金石萃編（前引），卷一三四，頁三一—四一。這事本不過形式，政治上也難免敷衍。而歐陽之所以寫得實有其事，無非促進和衷共濟。

(20) 頁一八〇，第三行，提到蘇舜欽和王益柔。可加註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一，頁三一，皆因薦召試，充集賢校理。因進奏院公宴醉歌不敬而被劾的一案，結果是貶斥，不更深罪。詳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頁四五—四八。

(21) 同上，頁一八〇，第五行，王拱辰。宋史卷三一八本傳說他交結皇宮，「入珠掖庭」。而邵伯溫，聞見前錄，卷二又說他送張貴妃定州產的紅磁器。

(22) 頁一九一，關於朋黨。上面第(18)條說過，濫用朋黨惡稱。歐陽本人，似亦不免此弊。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頁四五，歐陽攻擊監察御史王礪，說：「陰徇朋黨，挾私彈事。」

(23) 頁一九六以下，討論朋黨的各方面，應加註徐賓，歷代黨鑑（清本）。王桐齡，中國歷代黨爭史（一九二八）。雷飛龍，「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原因」（政治大學一九六三論文）。

(24) 頁二二一，歐陽的張甥姦情案。按這類控訴，有前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頁八，徐鉉被控通姦。雖證明不實，但仍受貶。而歐陽一案，除本人貶知滁州外，姪歐陽晟勒停。張甥與姦僕陳某杖脊，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頁五一。

(25) 頁二一二，審理張弼案有功的蘇安世，王昶有頗詳的記載，見金石萃編（前引），卷一四一，頁二

〇一二三。是劉次莊的「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蘇氏即蘇安世的季女。墓誌銘裡說她父親「以三司戶部判官治歐陽修冤獄。白修無罪，以此名聞天下。丞相王文公嘗誌其墓曰，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王昶又在這篇墓誌銘後加按語，補充說明人事關係。「按蘇氏爲趙揚之妻，揚爲趙忬之弟，（但是）史無傳。」這一段補充也可以幫助瞭解當時親友之間，有互通聲氣之處。

(26) 頁二五〇。歐陽修二次官司是長媳案。雖然他名譽很被損壞，但告發他的蔣之奇，也因此而爲人所不齒。多少年後，傍人還指出他誣告歐陽的過失。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五，頁二七。又職官六七，頁六。

目錄

引言

一

上編

歐陽修的學術與思想

(一) 歐陽的經學

.....

一九

(二) 歐陽的史學

.....

四七

(三) 歐陽的行政理論

.....

六一

(四) 歐陽的文學

.....

七八

(五) 歐陽的信仰問題

.....

一〇八

下編

歐陽修與北宋中期官僚政治的糾紛

(一) 歐陽的政治經歷

.....

一二九

(二) 歐陽的發跡

.....

一三一

(三) 范呂黨爭和解仇

.....

一四二

(四) <u>慶曆改革的由來</u>	一六一
(五) <u>慶曆改革及其失敗</u>	一七一
(六) <u>朋黨與言官</u>	一九〇
(七) <u>歐陽中年蹉跎與繼續鬥爭</u>	二一〇
(八) <u>歐陽與韓富當政——嘉祐治平之治</u>	二三四
(九) <u>被誣外任，反新法，與退休</u>	二四八

引用中日英文書目

引言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的名字和文字，常出現在不同部門的書籍。提起他來，無人不知。可是試問他的歷史地位究竟如何，却又不容易簡單答覆。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活動多，方面廣，值得注意的貢獻，比較分散。史籍之中，反倒沒有太多關於他的專著。（一）若干短文，總未免有片斷零碎之憾。本書的目的，即欲補此陷缺。參照歷來與近人的研究，整理有關的史料，加以補充，對於歐陽修的成就和貢獻，試作一個綜合的分析。

首先要說明三點要旨。第一：北宋中期是一個變化的關鍵。在學術上，儒教思想上，和政治演變上都有承先啟後的影響。在學術上，創立了後人所謂的宋學，其範圍很廣；有研究義理的，有研究象數的，有講功利的，有論制度的，有發揮政治經濟上新主張的，還有側重提倡社會道德和風氣的。在文學方面，有古文古詩的復興和詞的發展；在史學方面進步很多；在目錄學，金石學，以及其他若干專科學問方面，也有新的建樹。（二）

在這些生長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教思想的發展。在復古的旗幟下，一方面重視古典，一方面推陳出新，尋求新解釋，超越了漢唐以來的範圍。雖然不能比擬於「百家爭鳴」，至少也是諸說競起